

中国档案学的历史哲学反思

——以时空观和互动观为视角

闫 静

(山东大学,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创建,始于新中国的成立。70余年来,中国档案学已经实现从“无学”到“有学”、从“附属”到“独立”、从“零散”到“相对系统”的转变,在研究广度和研究深度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关照现实、深耕理论的社会科学,应如何走向学科的成熟与强大,仍是未来面临的核心问题。对中国档案学的历史哲学反思,则是档案学走向成熟的内在要求,是对档案学发展元问题的一种积极回应。以“关联性”所引申的时空观和互动观这一历史哲学的重要命题,思考中国档案学的时间性、空间性、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的互动性则为档案学元问题的反思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档案学理论; 历史哲学; 中国问题; 时空观; 互动观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20.05.006

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创建,始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中国社会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全面变革。伴随着这场深刻的社会革新,全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档案事业和档案学术研究也在摸索中不断成长。对新中国档案实践的掌握与思考、对民国时期档案学术思想的批判与继承、对苏联档案理论的吸收与借鉴,促使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档案学人开始对传统档案学术予以反思,对档案学的本质属性及其规律进行探索,对档案学理论与术业的关系进行辨析,对档案学的知识体系予以构想,力图推进中国档案学的独立化建制。伴随着这些“实质性”研究的开展,1956年发布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则对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属性与地位予以“官方性”的明确规定。从此,中国档案学在学科之林有了一席之地,尽管孱弱,但对其发展而言,却是一个伟大的开端。

在学科体系初步成型的基础上,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档案学继续稳步发展。在研究广度上,中国档案学以自身的理论视角为基点,引入历史学视角研究历史档案的整理与挖掘、档案与文明的关系、中国档案事业史及少数民族档案事业史;引入管理学视角研究电子文件管理的国家战略、档案信息资源的知识管理与集成管理;引入法学视角研究档案法律体系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修订、企业档案管理条例的制定;引入社会学视角研究档案与社会记忆、身份认同、公众信任的关系;引入传播学视角研究媒介变迁与档案工作、档案信息传播的原理与机制;引入信息技

作者简介:闫静,女,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现代语境中的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9CTQ034)。

术视角研究电子文件管理系统、数字档案资源长期保存、数字档案馆建设以及新兴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等等^①。在研究深度上,档案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研究逐步深化。“档案”的原始记录性、档案学的“历史主义”之魂、档案学两大支柱理论在新时代的革新、档案鉴定理论的范式转化、档案记忆观与档案多元论等研究领域得以深化。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促使档案学逻辑架构、精神风范和学科规范渐趋完善。

然而,尽管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历经了70余年的发展,但与其他类型的哲学社会科学相比,中国档案学仍属于一门“微小”“冷门”而又“年轻”的学科,面临的问题仍有很多,其中的核心问题即是如何走向成熟与强大。走向成熟包含两方面愿景:一是继续强化档案学的创新性发展,二是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弥补其理论研究水平不高的短板。走向强大同样包含两方面愿景:一是立足中国,在借鉴国外的基础上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档案观;二是挖掘历史,在把握当代的基础上打造中国特色档案学派。对中国档案学70余年的发展历程予以回顾,并对其中的关键性症结进行反思,是实现上述愿景的重要途径。

而对某一学术的反思需要历史哲学的指引。综观中西历史哲学的发展,“关联性”乃是其重要命题。翦伯赞将关联性问题解释为“历史之时间上的相续性、空间上的联系性以及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不可分裂性的问题”,并认为“一个正确的史的唯物论者,是时时刻刻在把握这一历史的原理,以从事于人类历史之活生生的全面的究明”^②。翦伯赞的历史哲学观亦对档案学的学术反思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档案学的时间性

从时间性反思档案学的发展历程,可将其视为基于时间性而构成的一段学术史。另一方面,档案学的某些特质又凸显了时间性,正如“档案‘芬特’”“文献公布”等称谓只能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档案学的“行话”。如果反思档案学的时间性,那么“历史”“现状”和“未来”这三个时间的重要阶段成就了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脉络及社会地位。

(一) 对待档案学的历史遗产

档案学的历史遗产不仅是档案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更彰显了档案学“在场”及如何“出场”的姿态。在时间的维度下审视档案学的历史遗产,不管进步与否,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诸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档案学整体水平不高,但却奠定了中国现代档案学及档案高等教育的基础。然而,现状却是对档案学历史遗产缺乏应有的重视及客观的评价,突出表现为对档案学历史遗产的挖掘不够,以及对档案学历史遗产的评价趋于模式化。现有档案学研究往往秉承一种固定的模式——多结论、少推论,如论及民国档案思想就必谈“十三本旧著”和“行政效率学派”。诚然“十三本旧著”及“行政效率学派”确实在中国档案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后人概述的称谓不仅是对历史遗产的极简凝练,同时这种固定的模式也为后继挖掘设置了一个无形的框架,相关著述在这一框架内难以推陈出新,这往往又造成研究路径的狭窄化,研究选题、研究思路渐趋僵化。现有对档案学历史遗产的研究多是如此,渐趋技术化倾向的学术研究日趋消解了对档案学历史遗产应有的重视。当前的现实是,对档案学历史遗产的评价深刻洞见者少之,反而是随着文献计量方法的普及,文献综述类评价日渐增多。似乎掌握了一定的分析工具、研读了一定的相关成果,那么综述类评价就成了“人人可为之”的研究课题,评价的目标反而被弱化。

因此,笔者认为对待档案学历史遗产正确的态度,应是将静态的“时间意识”转化为动态的“价

^①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多学科视角下的档案学理论研究进展》2014年7月。

^②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29页。

值推动”。也就是说对待历史遗产不能轻视化、简单化,但对历史遗产的重视也并非是在大量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一个模式化的评价基调,而是要着眼于历史遗产研究的目的及其对档案学术研究的价值,将价值性、逻辑性、学理性等观念铭记于心。

(二) 对待档案学的当代发展

档案学的当代发展应顺应时代。顺应时代即响应时代发展对学术研究提出的挑战,不墨守成规、不违背时代规律。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观念的渐趋成熟,档案学的当代发展逐渐走向更加自觉与理性之路。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档案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的“去档案化”与“泛档案化”、研究领域的本土化与国际化,还是在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与独特化方面,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著述问世,中国档案学的学术独立性更加突出。

档案学的当代发展应对一些核心问题予以深化研究。档案学的两大支柱理论——来源原则及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历经萌芽、确立、挑战、调整、完善的发展过程才逐渐成为档案学术共同体的“共同信仰”,这也正是支柱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而从面对专业术语的表述不一、各分支科目知识结构的亟待完善,到面对多元文化强调的差异性,再到面对后现代主义强调的质疑与批判、建构与解构,当代档案学理论变得愈加具体化,伴随而来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正是分歧与争论导致档案学核心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化,促使档案学保持生机与活力。尤其是在今天学术环境之下,当那些低水平重复再次成为学术发展的顽疾与沉疴之时,这也提醒我们,对核心问题的深化研究理应成为档案学当代发展的重要方面。

档案学的当代发展应构建一套自洽的学术标准。尽管改革开放之后,学术标准的建立对于档案学甚至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已成为当务之急,尽管老一辈档案学家以革命者的热情、以朴素的价值观、以言之有物持之有据的治学态度努力推动中国档案学的规范化发展,然而时至今日,整体上我国学术成果质量并不高,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直未能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和建立起真正的学术标准”^①。这也凸显出学术标准建立的急迫性与重要性。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虽然中国档案学已在独立学科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档案学的当代发展仍应吸取历史教训,积极思考并尽早构建一套自洽的学术标准,以免陷入“人人争做大题目、篇篇讨论大问题”^②的不良循环。

(三) 对待档案学的未来图景

对未来的畅想已成为学科发展研究的必要环节,并成为学人进行学科建设时需要审慎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之初,档案学人对档案学的未来规划与畅想多是具体的、明确的、朴素的,在“建立与发展档案学”的愿景下,未来图景具象为研究规划与具体措施。然而,历经70余年,档案学的未来图景不断变化,且愈加难以揣测。而在不断变化的未来图景中,档案学人应秉持学科自信与危机意识的并重,秉持“内容图景”与“社会图景”的并重。

首先,秉持学科自信与危机意识并重。面对未来难以预测的技术革命及各种社会思潮,档案学唯有以学科自信的姿态迎接挑战,方可在学科体系中不断巩固自身的学科地位。而档案学的学科自信需要建立在对学科传统底蕴的挖掘、对世界优秀成果的解析、对自身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与合理认知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学科自信并非盲目乐观,而应时刻保持危机意识,一要思考新环境下如何准确自我定位,避免沦为“今之学者为物,其终至于丧己”^③的实例;二要探索传统档案思想在现代社会如何展现出新价值,固本培元、纵横拓展、开阔格局,从而实现学科突围,应对外界的质疑。

①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

②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

③朱熹、吕祖谦《近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

其次,秉持“内容图景”与“社会图景”并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直以来便是档案学科的重要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二者的关系也变得日趋复杂。理论界自恃所研究的课题源于实践但又领先于实践,是实践界的保守制约了理论的应用;而实践界则认为档案理论只能算是“爬行的哲学”,不能烛照和引领档案实践的未来。这也为档案学的未来图景提供了反思空间,即档案学术研究既要关注“内容图景”,也要关照“社会图景”。具体言之,档案学术研究的“内容图景”即倡导学术研究发挥预测性与前瞻性的引领作用,注重提出问题,对新趋势及跨学科抱有接纳态度;档案学术研究的“社会图景”则倡导学术研究要关照现实、并非纸上谈兵,要有社会价值、而非博得一时效应。举例而言,如果说智慧档案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热门词汇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嫁接是“内容图景”的畅想,那么关于这些热点研究可能在今后产生何种应用价值与社会效应的理性认识与深入思考即是“社会图景”的畅想。因此,在档案学的未来畅想中,对“内容图景”与“社会图景”予以综合考量,才不至于使“畅想”变成“空想”。

二、中国档案学的空间性

“存在”的最基本内涵除了时间,还有空间。对中国档案学而言,时间范畴界定了其核心呈现方式,空间范畴界定了其外在社会关系,二者不可偏废。中国档案学的空间性可二分为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其中,地理空间之地理因素、社会空间之权力因素、史学传统与技术发展形塑并影响了中国档案学的发展特色、学科定位、学术传统与演进未来。

(一) 地理空间之档案学进程中的地理因素

档案学的产生与发展毫无疑问地处于一定的地理空间之中,而不同地理空间的档案学又被赋予了不同的特质与学术传统。综观档案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脉络,地理因素对档案理论范式的影响可谓源远流长。约翰·利登纳在《从滩涂荒地到后现代主义:档案理论简史》一书中就将多样化的地理位置所产生的特殊档案需求视为不同范式产生的重要基石,并直言“地理因素是区隔不同理论传统和形势下档案工作者特质的重要因素”^①。在利登纳的研究中,正是19世纪晚期,处于从微小地方型政府发展成为崭新政权的荷兰,方能产生巩固国家档案馆藏的强烈需求,而这种需求继而转化为对一种清晰工作指南的炽烈理论探索;正是与欧洲大陆相区隔、且有别于欧洲大陆及北美的民主制和君主制统辖方式、并免于战事的英国,才能孕育出詹金逊式的古典档案学;正是二战后独特的国家治理与文化环境、且缺乏中世纪档案管理传统的美国,方可催生出谢伦伯格式的档案管理新范式;正是国家边界日益交叉、对合作理念日益强调、后民族国家主张背景下的北美和西欧,方可产生出最新的质疑性档案学理论范式——可见,不同地理空间的档案工作者采取了适合自身的档案理论以促进档案实践的发展^②。而处于亚洲大陆的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及学术传统、独具一格的语言谱系与研究范式,使得中国档案学在世界范围内学术输出与输入处于严重不对等状态。无论是民国时期的学习欧美,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学习苏联,抑或是改革开放后开始放眼全世界,这些转变虽然可喜,但受地理空间的影响,中国档案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融入感仍需进一步加强。

(二) 社会空间之权力因素、史学传统与技术发展

美国学者爱德华·苏贾以三大空间化理论构建了其空间哲学,“企求重新平衡历史、地理和社

^①John Ridener, *From Polders to Postmodernism: A Concise History of Archival Theory*, Duluth: Litwin Books LLC, 2009, p. 153.

^②John Ridener, *From Polders to Postmodernism: A Concise History of Archival Theory*, Duluth: Litwin Books LLC, 2009, pp. 153 - 154.

会三者之间可以阐释的交互作用”^①。苏贾的空间哲学将社会空间视为后现代文化的重要场域。在空间哲学中,社会空间的“容器”里包含了诸多要素,涵盖了社会动力和社会意识的方方面面,这些因素扩展了空间问题分析的框架。处于社会空间的中国档案学,其样态更多地受权力因素、史学传统与技术发展的影响,这些因素的此消彼长不断作用于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呈现面貌。

权力因素对档案学的影响通常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呈现,虽不易察觉但却无处不在。当今时代,权力的概念日益宽泛化,除“国家制度、经济体制、科层机构、国际关系、政党、议会、政府、工会等社会权力关系”外,在今天更多的是指“性别、种族、民族、族裔、性、年龄、地缘、生态等文化权力关系”^②。综观权力因素对档案学的影响,社会权力的影响逐渐淡化,而文化权力的影响则后来居上,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对档案学研究议题的引导与规制。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社会权力对中国档案学产生直接影响的最鲜明时期,彼时的国际关系决定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档案学在创建时期的效仿对象、创建模式与研究基调,并由此形成了档案学研究的各分支科目。社会权力的直接影响毫无疑问以一种强大的外在力量推动了中国档案学的发展步伐,并形塑了档案学研究的时代特色。随着形势的变化,社会权力不仅在档案学领域,而且在整个学术领域的直接干预作用逐渐消退,转而以一种间接方式引导并规制档案学的发展方向,如各层级各类别科研基金项目的设立、申报、评审机制,各种学术奖项的审查与监督机制,学术著作的出版与评价机制,学科评估与“双一流”建设机制等,这些机制构成了社会权力对档案学发展间接影响的新形式。

随着社会权力对档案学影响方式的转移,文化权力开始发挥其引导与规制作用。性别、种族、民族、族裔、年龄、地缘、生态等文化权力逐渐渗透到档案学的方方面面,充实了档案学的研究议题。档案界日益强调流动时代档案学的跨学科研究,运用诸如媒体考古学、言语行为理论、信息科学、数据科学、哲学、符号学、文类研究、组织科学等跨学科理论^③,试图跨越学科的边界,研究少数民族、边缘群体、社会治理、伦理、社区等方面的档案问题。如果将这些研究议题与改革开放之初的议题相比较,那么不难发现其差异之大与变化之迅速。这种研究的转向表面看来是学者关注焦点的转移,实则却是文化权力转向在档案学研究中的折射。受文化权力影响的中国档案学不仅拓宽了其研究视域,还焕发了学术研究的生命力。

史学传统对档案学的影响通常以一种若即若离的方式呈现,虽逐渐弱化但仍如影随形。档案学与历史学的密切关系已毋庸置疑,中国档案高等教育发端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史学色彩和历史思维在档案学研究中颇为盛行,彼时,档案学与史学相互渗透。但随着档案学的信息化特征凸显,历史化特征逐渐淡化,史学传统对档案学的影响有所减弱,从学科分类上,档案学也从历史学的历史文献学类别转为管理学类别。尽管史学传统在档案学领域的渗透逐渐式微,但历史学的理性光芒仍一直伴随着档案学的发展。其中,史学传统之求真的探究精神、垂训的镜鉴精神、人本的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程。

史学传统之求真的探究精神促使档案学进行价值追问。传统史学强调如实直书及严谨表述,意在彰显史家修史的实事求是与科学考据。在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程中,“求真”也一直贯穿于档

①[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4页。

②姚文放《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

③Frans Smit, Arnoud Claudemans, Rienk Jonker, *Archives in Liquid Times*, Amsterdam: Stichting Archiefpublishing, 2017, Forword p. 1.

案学术研究的始终。档案“原始记录”的本质属性不仅奠定了档案学术的研究基础,而且还延伸到了档案价值及其鉴定、电子记录真实性与可靠性保证等方面的研究中来,此种“求真”的价值追问确立了“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档案事业定位。史学传统之垂训的镜鉴精神促使档案学关注社会功能。史学强调“治史而知世”及“以史为鉴”,意在彰显历史对现实的指导和借鉴作用,以实现“无用之用”的治学境界。档案学虽有别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但史学此种对“现实”的意义探索和实践关照更应是档案学所珍视的学科品格。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唯有与社会相连、从库房走入社会、从幕后走向台前,档案学方可实现学科价值、展现理论魅力。史学传统之人本的人文精神促使档案学兼具人文情怀。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强调人本理念与人文关怀、强调面向大众与面向社会,这对日益崛起的技术至上主义而言是一股强大的缓冲与牵制。技术与人文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档案学在技术发展的浪潮中开始关注人文、关注技术与人文的结合,并将群体的符号、价值观和规范予以档案化的视角阐释,这种学术自觉既带有史学传统之人文精神的烙印,又满足了档案学研究的文化期许,促进档案学社会责任和文化价值追求的双重实现。

技术发展对档案学的影响通常以一种显性的方式呈现,并逐渐引领档案学的发展方向。技术发展对档案理论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于伴随着每一次技术革命,文件与档案的数量都会大幅增加,这就需要新的档案理论范式和实践转向予以应对^①。尤其是计算机技术革命中通信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全新技术革命中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的趋势,不断改变着档案理论与档案实践的传统模式,档案保管理论、鉴定理论、利用理论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革新,电子化、数字化、媒体化、数据化等也成为中国档案学研究无法忽略的新趋势。

而技术发展对学科的影响不仅是工具理性的,更是价值理性的,这就涉及技术哲学中所强调的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融合式发展对学科的导向作用。技术哲学的工程学传统强调科学精神,“着重从内部分析技术,体现的是技术自身的逻辑”^②。档案学逐渐向技术靠拢,并将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应用于档案学的研究议题,实则是在技术浪潮的裹挟之下,所做出的一种被动式应对。但对“技术自身逻辑”的分析并非档案学的强项与特质,如果过于强调技术,那么,档案学在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夹缝中很难有所建树,档案学的学科属性也会消解于技术化的漩涡。正如 iSchool 运动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张,导致国内外院校在学院改名、学位改名与学科重组过程中,逐渐去“library/archive”倾向,转而与计算机系/学院/学科合并。数据科学的兴起,有淘汰传统图书情报档案学科之虞。但技术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则不然,人文主义传统强调人文精神,“侧重于从外部透视和解释技术,展现的是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③。此种互动,一则是对技术至上主义的反击,二则体现了技术应用的终极价值。档案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已内化于学科的发展脉络,因此以技术为工具、并与社会文化进行嫁接,则是档案学所做出的一种主动式迎合,无论是对“记忆”主题的挖掘,还是对“认同”主题的探究,抑或是对“数字人文”主题的关照,均说明档案学正在技术的价值理性中不断寻求突破。

三、中国档案学中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的互动性

档案学中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的互动性体现在档案学的框架设计和前景彰显之中。框架即档案学的结构与功能,前景即档案学的社会意义及价值。对结构与功能的叙述是主观基于客观建构

^①John Ridener, *From Polders to Postmodernism: A Concise History of Archival Theory*, Duluth: Litwin Books LLC, 2009, p. 158.

^②王伯鲁《技术究竟是什么——广义技术世界的理论阐释》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③王伯鲁《技术究竟是什么——广义技术世界的理论阐释》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的结果,而学科的社会意义既是内生的,也是被主体赋予的。因此,对档案学框架与前景的历史哲学思考,既是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档案学人学术反思的重要起点。

(一) 框架——档案学的结构功能及其叙述

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特有的组织结构、功能特性和外在形态。学科发展也不例外,一门学科的结构特征决定着学科的功能特性。而学科的结构和功能又是建构的结果,是基于客观社会环境和已有学科基础的主观性学术活动的产物。对于中国档案学而言,档案学的结构表现为学科结构和教材结构的同一性,档案学的功能表现为档案学在学科生态系统的自主性及其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协同性,档案学结构与功能的叙述模式日益趋于开放性、多元性、关联性和动态性。

长期以来,中国档案学的学科结构与教材结构存在着高度的同一性。档案学的学科结构即档案学基础概念、原理、理论、原则、分支知识领域按照一定的逻辑联系所形成的知识体系,是档案学知识积累和系统化的结果。档案学的教材结构是为了教学方便的需要和知识易接受的考量,将学科结构按照教学大纲予以适当转化的结果。由此可见,学科结构通过教材结构表述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科与教材之间的等同。教材的编写虽也属于学术研究的一种类别,但学术研究并不是编写教材。诚然,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彼时基础不牢、学科地位不稳的中国档案学,档案学人选择以构建学科体系为出发点,并将学科体系的构建活动具化为教材的编写活动,“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学术创新,其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永远值得后学敬畏”^①。但此种将学科建设与教材编写合二为一的做法却一直影响着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程。如果说“教材式”研究是一种“全面的肤浅”,包含着已初步达成共识的观点,“专著性”研究则是一种“片面的深刻”,包含着作者独到的见解。因此,档案学的结构不仅是教材的浓缩,还应蕴含着一种关于研究对象性质的形而上学的观念,将研究的领域边界、探究活动所需合法的方法论、引导探究过程的观念与思想涵盖其中。

档案学在学科生态系统的独立性及其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协同性彰显了档案学的功能特征。学科功能作为学科结构的生命外延,在内部多变的学科生态系统及外部复杂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唯有不断突破学科旧有结构的限制,方可彰显其生命力。中国档案学也唯有突破其既有的学科结构,方可激发出理论张力和现实关照力。其中,档案学的理论张力既来源于档案学在学科生态系统中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交流,以跨学科研究为方法论合理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又来自于档案学在学科生态系统中时刻保持自我特质,并以自身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反哺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而档案学的现实关照力则来源于其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密切关注。随着社会发展多元化、全球互通网络化、生活方式智能化的趋势,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不断变化与拓展。档案学唯有关照现实、把握时代脉搏,才能准确把握学科的功能定位,实现档案学当代功能的拓展与提升。

档案学结构与功能叙述模式的开放性、多元性、关联性和动态性预示了档案学的未来走向。目前学界对档案学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多以档案学分支学科为切入口,探讨具体的学科结构与功能设置二者间的关系。而在档案学结构与功能的演进历程中,行政管理的外在推动力与科学理论发展的内在推动力,都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前述社会权力与文化权力对学科的影响,处于社会权力视域中的档案学建构,行政因素的作用总是不可避免的,在社会权力向文化权力转移的背景下,档案学结构与功能所缺失的“社会需要”和“科学逻辑”是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时候了,档案学的结构与功能叙述模式也逐渐趋于开放、多元、关联和动态。开放即档案学的社会渗透性更强,多元即档案学的研究议题更多样,关联即档案学的认识之链更复杂,动态即档案学的研究理念更富时代性,这些趋势又进一步推动了档案学结构的优化和功能的拓展。

^①董天策《问题与学理:新闻传播论稿》,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二) 前景——档案学的社会意义及其重读

随着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演进与更迭,学科的未来性既得益于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与理论传承,更得益于其社会意义的解读与探索,学科的价值和生命力蕴含于其社会意义之中。中国档案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即已得到明确表述,档案学的社会意义更多地体现在为档案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而在如今信息即是生产力、研究范式转换、核心价值重构的时空背景下,重新认识并评估档案学的社会意义,既是档案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档案学人对档案学发展前景的一次理性思考与回答。

档案学的社会价值根基在于档案的原始记录属性。档案学研究不仅需要向档案学术共同体彰显其价值,还需要向学界同行、社会公众证明其意义,如只关注前者,忽视后者,那么这一学科在学术生态系统中、在社会大众心目中被轻视、忽视甚至无视也就难以避免了。目前,档案学的社会价值在社会系统中仍处于被轻视的状态,档案利用不畅所导致的学科声誉不佳的现象也是由来已久。另一方面,社会对档案日益高涨的利用需求,本质上源于档案这一信息载体无可比拟的社会价值,而档案的原始记录属性是档案社会价值的根基,是档案职业不可替代、档案事业持续发展、档案学术研究存在的依托和根本,是档案学术本身学理性的落脚点。档案学术研究唯有以维护档案的原始记录性为使命,才能使档案学在学术生态系统中打造出自身的学术品牌,使档案学的社会价值富有现实意义。

档案学的社会价值归依在于档案学人的理论阐释。齐格蒙·鲍曼将知识分子分为“立法者”和“阐释者”,并认为二者角色分别是对现代型和后现代型知识分子策略的最佳描述^①。处于学术象牙塔与社会公共空间的档案学人,也一直在“立法者”和“阐释者”之间寻找自身的定位与身份的平衡。档案学人一方面以“立法者”的心态,试图将所研究的理论问题转化为政策内容,从而使理论发挥其实际效力;一方面以“阐释者”的心态,试图对现有政策予以解读,为政策的合理性或失范性提供注脚,抑或为现有学术现象提供档案学视角的阐释,拓展学术研究的多重可能,提高档案学的社会认知度。无论以何种心态开展研究,档案学人逐渐推动了档案学价值形态由“内隐”向“外显”转化,扩充了档案学的社会参与度,使得档案学在证据、记忆、认同以及社会/社区研究范式^②的指引下实现与社会的多重结合。

(责任编辑:张利文)

① [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6 页。

② [加]特里·库克《四个范式:欧洲档案学的观念和战略的变化——1840 年以来西方档案观念与战略的变化》,《档案学研究》2011 年第 3 期。